

# 她們的征途

伍維婷

世新大學性別所助理教授

**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

台北：八旗文化，2017年

趙思樂著

這是一本當代中國女性抗爭者的重要紀錄文本。全球都一樣，人們的眼光總是追隨著烈士，女性抗爭者的身影卻鮮少被記錄。在台灣，不夠多的台灣人還記得「刺蔣案」裡的抗爭者黃文雄先生、鄭自財先生和賴文雄先生，然而，更少更少的台灣人認識「刺蔣案」裡的黃晴美女士。

在《她們的征途》一書中，作者趙思樂紀錄了艾曉明、王峭嶺等、寇延丁、王荔蕪和葉海燕，這些女性走上抗爭之路的原因，以及持續在面對的打壓。但趙思樂不僅僅只是紀錄，她還為讀者梳理了變動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從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中央政府如何處理1989年的天安門事變，如何在經濟改革開放後，面對日益形成的公民社會，採取何種治理策略。

在第一位女性抗爭者艾曉明的故事中，趙思樂介紹了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與劉曉波在民主運動中的選擇。第二批抗爭者是關於維權律師的伴侶：原珊珊、王峭嶺和李文足等，當然一起登場的是維權律師們：謝燕益、李和平、王全璋和高智晟。在介紹第三位女性抗爭者寇延丁的同時，我們看到了中國非政府組織最為劇烈變動的時代：許志永、郭玉閃、陳光誠、公盟、傳知行、立人、愛之行和益仁平，這是中國權利型與服務型非政府組織都生猛有力的一個時代。

因為第四位女性抗爭者王荔蕪是互聯網運動的一員，藉著她的故事，趙思樂整理了中國互聯網抗爭的始末。九零年代末，當中國的高校（大學）在學生

宿舍開啟網絡服務後，開始形成互聯網的公共性，後來甚至出現所謂的「推特黨」。推友們完全符合社會運動理論中關於組織的定義，他們事前聚集沙盤推演，討論在抗議現場的分工，到了聲援的現場使用統一的標誌，一起呼喊口號，同時進行推特上的文播。

葉海燕是《她們的征途》最後一位主角，她是一個從提供服務給性工作者的服務型非政府組織轉型成全力宣導型非政府組織的例子，挑戰的是華人文化裡的性禁忌。趙思樂在這一段故事中，同時紀錄了當時愛滋防治領域，以萬延海為首，包括 170 多個組織的非政府組織聯盟，如何實踐由下而上的民主決策機制。

## 女性抗爭者的圖像

《她們的征途》從 2005 年的「太石村罷官行動」開始談艾曉明。艾曉明是這場抗爭的紀錄者，官方的人民日報曾經引用過「碎石堆上的民主」來描述這場抗爭。跟著艾曉明一起出場的是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一位國際知名的中國抗爭者。艾曉明是劉曉波同校同期同系博士生，國際間的知名度並不高，僅限於女性運動圈。中山大學的艾曉明老師以紀錄片為抗爭的工具，黑五類出身的她，在天安門事件的尾端才參與了運動，一直到因為婦女團體的邀請，艾曉明在 2003 年於中山大學組織《陰道獨白》的演出，才開始接觸到攝影機的力量。

第二個出場的女性人物是原珊珊，她是維權律師謝燕益的妻子，再來才是維權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或許是因為王峭嶺在後來抗爭中的領頭角色，作者選擇以「王峭嶺等」形容這一批因為丈夫被抓而出面抗爭的女性。與其他抗爭者很不一樣的經歷，這群維權律師的女性伴侶可以說是「被迫」走上抗爭之路，因為她們的男性伴侶選擇與國家對抗，因為國家直接走到門前，走進門內的打壓，她們都共同經歷第一次察覺國家暴力的「驚慌、厭惡和受到威脅」。

接著出場的寇延丁，應該算是這本書中最符合傳統定義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但被國家暴力對待的方式卻也是最莫名的。原本在公務機關工作的寇

寇延丁，因為正義得檢舉長官貪腐，所以被迫下崗。在做一位作家的努力中，寇延丁察覺到身障者的社會處境，甚至進一步地投入到身障的公益事業中。根據趙思樂的紀錄，寇延丁最早只是因為希望能夠「推廣殘障美術家作品」，關於公民社會的理念或者公民社會與民主的關聯，都是後來才慢慢習得的。

第四位出場的王荔蕪，代表的是在中國一個很特別的現象：互聯網運動。由於中國威權政體的特性，互聯網一度被西方學者視為是社會運動裡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王荔蕪是個從工作崗位退休的紅二代，但卻因為一個訪民王靜梅的悲劇而開始了她的抗爭之路。最後一位出場的是葉海燕，也是傳統社會最難接受的一種抗爭者圖像，因為葉海燕挑戰著華人社會的性禁忌。葉海燕曾經是個性工作者，也持續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

## 國家的暴力，女人的身體

「困獸猶鬥」是《她們的征途》下部的標題，看完這一個部分，很多讀者也許會感到很絕望，因為龐大的國家機器是如此的暴力，綿密兇狠得鎚擊在每一個女性抗爭者的身上。劉曉波的伴侶劉霞在這裡出現，趙思樂還紀錄了《零八憲章》為公民社會曾經帶來的希望與隨之而來重重的失望。

艾曉明也簽署了《零八憲章》，她因此被趕出了學校，不能出國，也被趕出了共產黨。除了精神上的暴力，艾曉明所承受的身體暴力與威脅也不曾少過。自拍攝太石村人民罷官行動的紀錄片時，艾曉明經歷了走在路上被潑髒水，坐在摩托車上，被紅色鐵棍一劈再劈，所搭乘的計程車被大鎖頭連續敲打，把玻璃窗都打碎，這過程中所有的報警電話都沒有回音。

王峭嶺等是維權律師的伴侶，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在「709大抓捕」此一波及超過三百位抗爭者的事件中領受國家暴力的痛。國家暴力不僅僅只是針對成人，還包括他們的孩子。原珊珊的孩子在警察上門時不敢離開房間，八歲跟十一歲的男孩只能直接尿在自己臥室的地上；王峭嶺和李文足的孩子都面臨國家不允許上學的困境。

寇延丁所遭受的國家暴力是惡意且陰謀的，只是因為寇延丁參與了一場在台灣所舉辦的非暴力培訓。她被關押128天，只因為國家原本寫好的劇本是要

將香港的「雨傘運動」抹黑成是台灣「太陽花運動」背後的運作，而台灣「太陽花運動」在中國政府的眼中，又因為幾位年輕學子與六四組織者之一王丹的關係，而與反中共政權連結，所以在台灣參加完培訓課程的寇延丁，因著跟陳健民、簡錫和王丹等人的合照，而被關入獄。

王荔蕪因為慶祝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被治安拘留 8 天，後來又因為茉莉花革命而被軟禁，最終被帶走判刑 9 個月。趙思樂在記錄王荔蕪這段經歷的同時，回溯了她自己當時作為一個大學生怎麼成為一名關心公共議題的記者以及一位運動者的過程。王荔蕪在獄中的經驗不用太多描述，趙思樂用一個問題，點出了國家暴力的殘酷。

趙思樂追問了幾次王荔蕪，在獄中最難受的是什麼？王荔蕪閃躲了幾次後回答說，就遺憾沒把眼鏡帶進去，不然就可以折斷眼鏡自殺。她也說：「尊嚴大於生命，我自己結束，也是對侮辱的一種反抗。」這句話說明了一切，明了不需要言說就可以猜測的國家暴力。

葉海燕面對的國家暴力更是毫無底線的殘忍，因為葉海燕抗議小學校長性侵女學生的案件而為她惹來登門施暴的對待。一群人男女直接闖入葉海燕的家中，她讀初中的女兒也才剛放學回家，這群人在她的家裡語帶恐嚇，出言威脅，葉海燕四處報警，警察要不是不接電話，不然就是拒絕替她轉接電話給管區的派出所。這件事情最後居然是以葉海燕被拘留 13 天結束。

葉海燕遭遇的暴力並不因為拘留期滿而結束，葉海燕母女的家當被員警扔在公路邊，剛搬到艾曉明伸出援手的社區就被羈押。葉海燕一路被追趕，直到她選擇回到那個當初原本要逃離的湖北老家。

面對綿密而沒有底線的國家暴力，這些女性抗爭者並未退縮。如同葉海燕又離開了她的老家，繼續她的抗爭之路。女性抗爭者不僅沒有退縮，她們還彼此聲援。

## 女性抗爭者的彼此聲援

劉曉波入獄後，艾曉明去看劉霞，為她拍攝三十分鐘的影像。當葉海燕因為抗議小學校長性侵女學生的事件而被拘留時，艾曉明選擇以葉海燕的方

式聲援葉海燕，艾曉明脫去上衣，露出乳房，在胸前寫上「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維權女律師王宇得知葉海燕被抓捕時，也趕往廣西營救，雖然之後的「709 大抓捕」也讓王宇一家三口陷入國家暴力的掌控中。

王荔蕪因為訪民王靜梅的故事而踏上抗爭者之路。到處聲援的路途上，王荔蕪結識了更多的女性抗爭者，包括結為好友的天天海豚。在寇延丁的故事中，我們看到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梁曉燕對於寇延丁的協助與支持。謝燕益律師的伴侶原珊珊原本並不願意跟 709 家屬靠得太近，直到 2016 年二月，大腹便便的她要去取回戶口本，面對員警的刁難，陪著她的李文足哭了出來，王峭嶺對著員警說：「你們不給我任何東西都行，一定要給原珊珊」。

上述只是幾個例子，說明女性抗爭者彼此聲援彼此連結的情況。或許是因為類似的生命經驗，或許是因為面對過相同情境的歧視與壓迫，在《她們的征途》的記錄裡，出現好幾次女性抗爭者體會到另一位女性抗爭者的處境，便毅然決然突破原本對於自己的限制、升高抗爭力道的故事。

## 女性抗爭者所面對的獨特困境

《她們的征途》是一本重要的紀錄，紀錄的不僅僅只是在媒體上、在社群中較少被記錄的女性抗爭者，也記錄中國公民社會逐漸形成對政府的挑戰，以及隨之而來國家重重的暴力壓制。

這不是一本學術研究的書，但這本書做了很多政治、經濟、社會變動的過程，以及民間社會主動或被動的反應。看完這本書之後，也許讀者們會開始好奇，《她們的征途》中幾位主角都不是傳統性別運動的參與者，那麼中國的婦女運動、同志運動，以及 2012 年開始出現的女權行動派又是怎麼樣的抗爭經驗？也許也會好奇從中國共產黨革命之初，到 1995 年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再到民間由下而上推動家暴法的立法，這一看似「土壤豐厚」的女性運動，與女性抗爭者的關聯是什麼？

當然必須提及的是，女性抗爭者如何被社會對待，以及如何被男性抗爭夥伴對待。女性抗爭者多數時候不會是抗爭現場的領導者，甚至女性抗爭者投入對抗是因為她們的伴侶，例如「709 大抓捕」後出現的女性抗爭者。在《她們

的征途》中也寫到維權律師遭受壓力之後，而對女性伴侶出現粗暴的對待。這個當然不是個案，也不能因此就認為國家暴力要付完全的責任。因為，承受國家暴力的不僅僅只是男性抗爭者。

但當男性抗爭者對於女性伴侶的施暴，或者當男性維權律師對於女性抗爭者的性騷擾出現時，女性抗爭者面對的就不僅僅只是國家暴力，還有父權社會根深蒂固男性支配的議題。

作為一個女性抗爭者所要面對的困境更多：國家的暴力、男性抗爭者歧視性或是粗暴的行為，還有女性被賦予照顧的責任。《她們的征途》裡每一位主角都是一位照顧者，當她們在面對國家壓迫時，總有一個被照顧者會影響她們的決定。女性抗爭者的困境這麼多，但她們的韌性也更強大。因為，女性抗爭者在意的是人，就像艾曉明對趙思樂說的「她完全不是一個具有政治家思維的人，她是一個學者、紀錄片導演，她參與運動，其中所關心的只是問題、故事和人」。

女性抗爭者不太在意自己是否是抗爭現場的領導者，但女性抗爭者常常會是最後一個離開抗爭運動的人。艾曉明說的兩句話最能體現她們的狀況：「我只是現在才顯得比較突出而已」、「那是因為一大批關注社會的人已經被抓了，或者流亡了，大量的人不能說話」。

面對威權，紀錄是最好的武器，人民會知道一段以為空白的過去歷史，抗爭者會從中生出力，因為知道還有人同行。謝謝《她們的征途》！